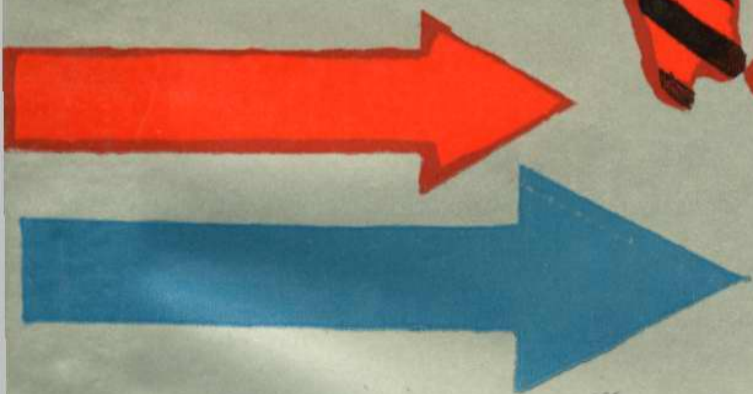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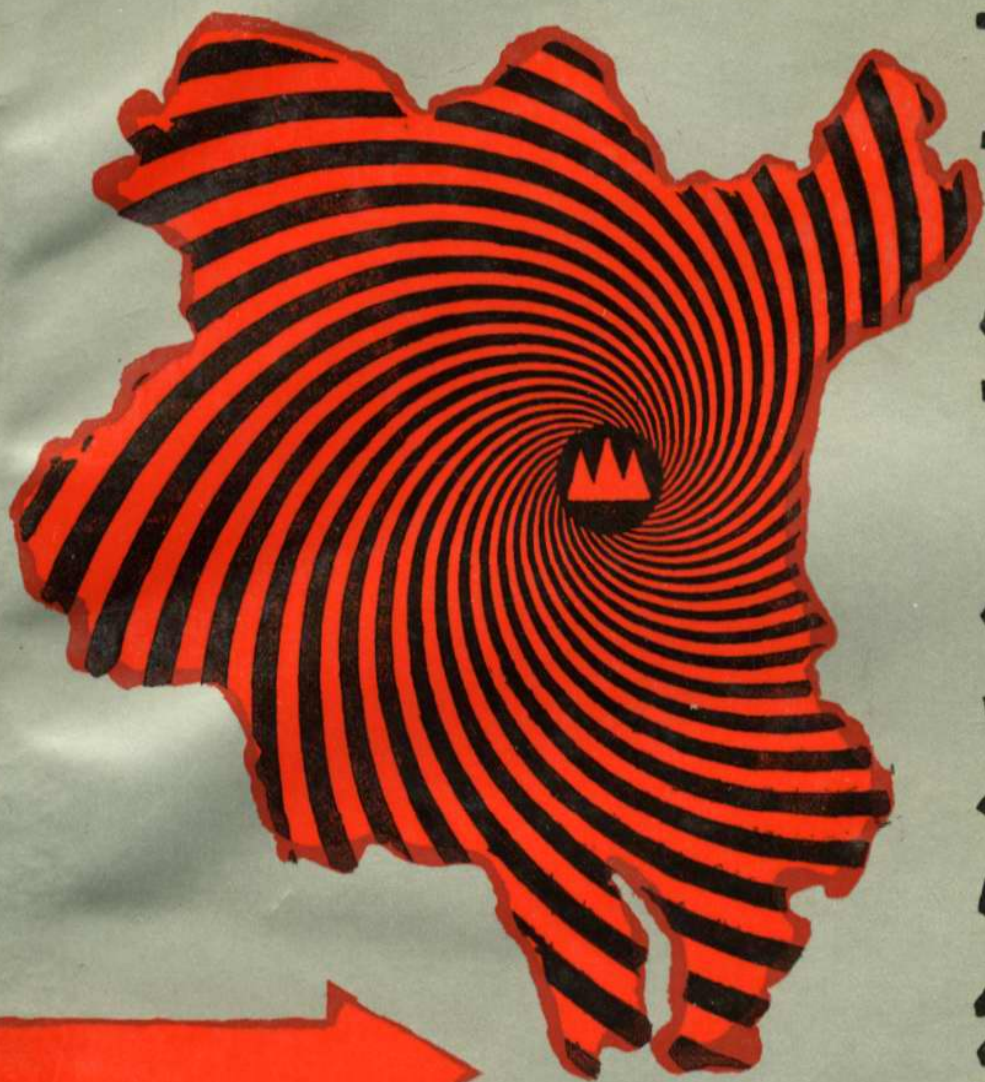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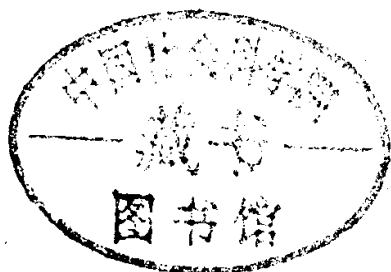
★  
重庆市经济综合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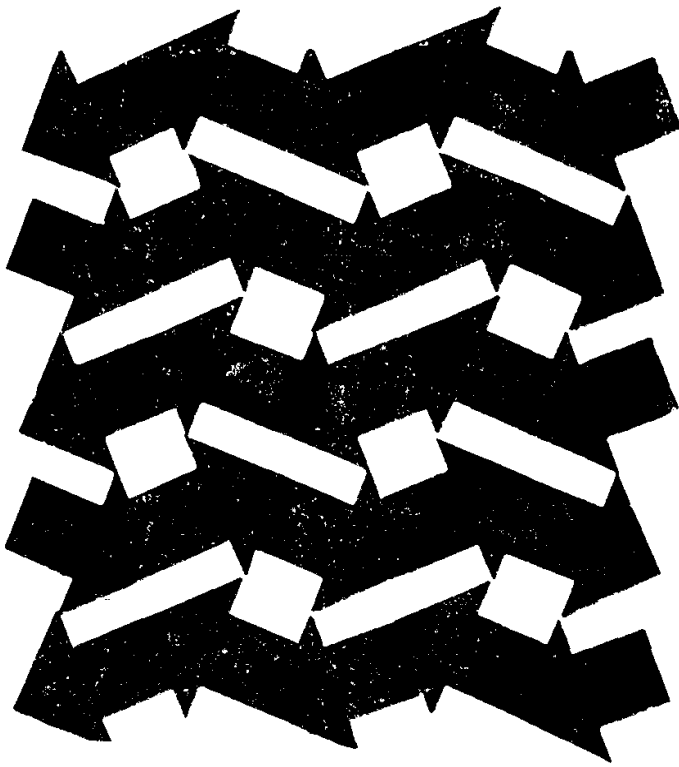
重庆市计划委员会编  
重庆出版社

贈給

柳端圖付主任



# 重庆市经济综合志



主审：刘黎平 主修：庞举  
第二章至第三章由胡正渝编修  
第四章至第九章由李卫红编修  
全书由童小平编纂成稿  
赵秋玲负责资料的整编工作

重庆市计划委员会编  
重庆出版社

# 前 言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市志办公室的指导下，我们经过2年的艰苦工作，在完成《重庆市计划管理志》的同时，完成了《重庆市经济综合志》。从宏观角度反映经济发展变化，在旧志书中从不见。因此，编写《重庆经济综合志》是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重庆经济上下20000年，本书记载了从远古~1985年止重庆经济发展的概况，着重反映清代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重庆经济发展的格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重庆的经济发展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

在编写中，鉴于时间跨度太长，许多方面的资料难以拉通采集，我们从实际出发，突破了志书横排纵写的传统体例，采取纵向分期、按期横排纵写的做法。同时，我们严格遵守志书写作的基本要求，编写中不带宣传性，不加感情色彩，对人直呼其名，对事客观记叙。我们希望《重庆经济综合志》能成为一部实实在在的、资料翔实、记叙客观的书籍，为各级领导、经济理论工作者、经济实际工作者以及山城居民了解重庆、研究重庆服务。未来是建立在昨天的基础上的，了解重庆的昨天，对于建设重庆更加美好的未来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重庆经济综合志》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而我们的学识与编写这样书籍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难免出现一些疏漏，敬请读者谅解，并力争在将要出版的专门志书中得到补正。

在编写工作中，我们得到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图书馆历史部、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档案室、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市计委办公室、市计委国土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1988年12月

# 目 录

<b>第一章</b>	概述 (远古~1985年) .....	(1)
<b>第二章</b>	远古至清代的经济状况 (远古~1911年) .....	(24)
	附表 1 ~ 3 .....	(36—39)
<b>第三章</b>	中华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 (1911~1949年) .....	(40)
	附表 1 ~ 6 .....	(53—58)
<b>第四章</b>	建国后国民经济的恢复 (1949~1952年) .....	(59)
	第一节 接管重庆, 控制经济命脉 .....	(59)
	第二节 进行土地改革 .....	(62)
	第三节 稳定经济与恢复生产 .....	(64)
	附表 1 ~ 3 .....	(67—68)
<b>第五章</b>	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953~1957年) .....	(69)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 .....	(69)
	第二节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 .....	(75)
	第三节 “五年经济建设” .....	(79)
	附表 1 ~ 5 .....	(87—89)
<b>第六章</b>	“大跃进”与国民经济调整 (1958~1965年) ...	(90)
	第一节 以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 .....	(90)
	第二节 城郊“人民公社化”运动 .....	(93)
	第三节 严重的自然灾害 .....	(94)
	第四节 调整国民经济 .....	(95)
	附表 1 ~ 6 .....	(99—103)
<b>第七章</b>	“文革”中的生产建设 (1966~1975年) .....	(104)
	第一节 国民经济状况恶化 .....	(104)

第二节	“抓革命、促生产” .....	(105)
第三节	“三线”建设 .....	(180)
	附表 1 ~ 5 .....	(113—117)
<b>第八章</b>	<b>国民经济徘徊发展 (1977~1978年) .....</b>	<b>(118)</b>
第一节	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	(118)
第二节	经济建设出现新冒进 .....	(120)
	附表 1 ~ 5 .....	(122—124)
<b>第九章</b>	<b>国民经济的再次调整 (1979~1982年) .....</b>	<b>(125)</b>
第一节	贯彻新的调整方针 .....	(125)
第二节	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成效 .....	(131)
	附表 1 ~ 5 .....	(135—137)
<b>第十章</b>	<b>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83</b>	
	~1985年) .....	(138)
第一节	改革经济体制 .....	(138)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 .....	(153)
<b>第十一章</b>	<b>大事记 (远古~公元1985) .....</b>	<b>(162)</b>
(一)	附录 .....	(201)
一	统计资料表	
表 1	1949~1985年重庆市工农业总产值及其比重情况	
表	.....	(201)
表 2	重庆市农业结构变化情况表 .....	(207)
表 3	重庆市工业结构变化情况表 .....	(208)
表 4	1953~1985年重庆市财政收入情况表 .....	(209)
表 5	1953~1985年重庆市财政支出情况表 .....	(211)
表 6	1952~1985年重庆市银行信贷情况表 .....	(213)
表 7	1950~1985年重庆市基本建设投资情况表 .....	(215)
表 8	1952~1985年重庆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情况表 .....	(217)
表 9	1951~1985年重庆市价格指数表 .....	(218)

表10	1949~1985年重庆市粮食总产量情况表.....	( 219 )
表11	1985年重庆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表.....	( 220 )
表12	1985年重庆市主要农副产品产量表.....	( 221 )
表13	1985年重庆市在校生人数情况表.....	( 221 )
表14	1985年重庆市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情况表	( 222 )
二	本书参阅重要资料目录.....	( 223 )



# 第一章 概 述

(远古~1985年)

重庆从采集经济状态发展到现代经济建设，经历了20000年漫长的历史。公元前20000年左右，重庆处于采集经济状态。公元前4000~5000年这一时期，重庆经济已以原始农耕和渔、猎生产为主。公元前500~600年间，巴族在部落联盟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以重庆为政治中心的巴国，处于氏族集体经济状态。公元前314年，秦国灭巴国置巴郡，直到公元1911年清帝退位，清代结束，重庆处于封建社会经济状态。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庆已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镇和对外贸易口岸。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政府迁到重庆，1940年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民国时期，近代工商业发展起来，奠定了重庆近代经济的基础。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到1985年，重庆经济、科技、社会都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具备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相应的中心城市功能。

重庆经济发展，与其自然地理和资源方面的特点分不开。横贯重庆全境的两江干流，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地貌，温暖湿润的中亚热带气候，自然资源丰富，多样组合情况良好，这是重庆市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四大显著特征。

第一，重庆市中心区处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口，是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及海外联系的水运枢纽。两江干流的存在为重庆市成为西南唯一的内河外贸港口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使重庆经济成为长江大流域经济的重要部份。

第二，重庆市内山地占62%，丘陵占35%，平坝仅占3%。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加之气候条件的影响，一方面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多种生物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不利于市内交通的建设和工业、市政用地的选择。

第三，重庆市的气候条件与四川盆地一致，但又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常年气温高于川西平原，夏日漫长炎热，秋末、初春多雾，多春旱、伏旱等灾害性天气。这种气候条件，一方面有利于柑桔、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农业生产条件呈不稳定性。

第四，重庆有丰富的煤、天然气、石灰岩、石英砂等非金属矿藏，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相当丰富，地下天然饮用矿泉水属全国三大富庶地区之一，从而为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这些自然地理状况和资源条件是重庆经济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

从古人类的简单生产、生活活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进行的现代化建设，重庆经济跨越了20000年的历史长河。

据重庆地区的考古资料分析，20000年前左右，重庆地区由于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高，适宜植物、动物的生长。古人类在重庆地区的林缘地区和江边的平台上，靠围猎林边野兽和采集森林果实和挖掘植物根块生活，共同劳动，获得的食物平均分配。公元前四五千年，重庆地区的古人类已掌握了植物栽培、用网捕鱼、烧制陶器、用野生纤维捻绳等原始农业、渔业和手工业技术，过着原始农耕和渔猎的简单生活。公元前五六百年间，住汉水流域的巴族向西扩张，来到重庆，春秋战国之交，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国家——巴国。史书记载，巴子都江洲。巴族来到重庆与原有的土著民族一起，对重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把生产和生活的区域从江边和少数林缘地

带扩展到川东丘陵地带，采用木耜耕地，借烧山草灰作肥，种植稻、黍（黄米）、麦、稷（小米）等五谷，芳弱（魔芋）、纒（苕麻）等经济作物和给客橙（柑桔）、荔枝、香茗（茶叶）、天椒（花椒）等经济林木，还养蚕和喂六畜（据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巴国的家庭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铜器炼制已掌握了采矿、冶炼、治模、浇铸、修整等工业，能生产铜兵器、铜乐器、铜酒器；制作陶器全用轮制，并用陶杵模压成花纹，分为土红色、红灰色两种色调，能生产陶盆、陶罐、陶盘等；同时，还纺制麻布和绢、编制竹器、制作漆器等，并开始采制食盐和制作堕休粉（用其描眉）、酿制清酒。巴国居民结舫水居，以独木舟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巴国的土地、牧场、牲畜等生产资料归氏族集体所有，生产的产品除留一部分用于氏族、部落联盟祭祀、军费和酋长开支外，其余的分给各个家庭用于消费和交换本氏族不生产的产品。巴人，“立市于龟亭北岸”（今巴县冬笋坝），以物换物，调剂余缺，各得其所。

公元前314年，秦国灭巴国置巴郡，张仪率人在今小什字一带修江洲城，从此，重庆成为秦国36郡之一并进入封建经济社会状态。这一时期，巴郡每年要向秦国纳贡交税。巴郡时期，传进了蜀国施肥和灌溉等农业生产技术和秦国的冶铁技术，大大提高了巴郡的劳动生产率。农业方面，改木耜为铁耜，并使用牛和马牵引，掌握了二十四节气，按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并开始加强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金属冶炼、制陶、采矿等都出现了专门的加工工场，铁器进入了生产生活领域，铜器制造技术进一步提高。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和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公元前300年，出现了专门经营产品交换的商人和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

汉承秦制，东汉时期的巴郡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53年，江洲城已成为工商业人口汇集之地，出现了一些大地主、大

商人，拥有100多万人口。经过三国两晋的动乱，江洲变成一个仅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凉破城。直到唐代和宋代前期，重庆经济才得以恢复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产量和人口比汉代大为增加，纺织业、冶炼业、军器制造业、造纸业、印刷业等都发展起来且有显著提高，集市贸易繁荣，出现了夜市、花市、草市、药市等等。百姓安居乐业。文化艺术也繁荣起来。从大足宋代石刻中可窥见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一斑，在经济萧条、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动用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修建大足石刻这样规模宏大、技术精湛的石刻长廊的。在宋末抗元战争和明末农民起义的影响下，重庆人口锐减，田土荒芜，城池草生，经济备受破坏。

清代，重庆封建经济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近代经济也开始萌发。清代初期，政府鼓励垦荒，组织军队耕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后，近代工业和交通业发轫。1862年，玻璃制造业开始发展；1879年，对外贸易业开始发展；1890年，火柴制造业开始发展。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由于受到西方工业技术和外国资本的刺激，工业和交通航运业发展较快。1899年，煤炭和石油开采业开始发展；1900年，棉织业开始发展；1903年，川江航运业开始发展；1907年肥皂制造业开始发展；1908年，电力工业开始发展；1908年，针织业开始发展。到清末，重庆已发展起近代工业的10个产业，共计有上百家工厂。当时的工人成为重庆最早的产业工人。整个资本中以民族资本为主。这时期的商业包括对外贸易和对长江下游的贸易获得了整体上的发展，重庆成为西南各地出口贸易和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贸易的中心枢纽。开埠后，出口的肠衣、药材、山货等日渐增多，进口的洋货也逐年增加，到1911年，出口土货总值达1000万海关两，进口洋货总值达1200万海关两，入超为200万海关两。在重庆由商人组织、政府督导的以保护各省往来商人的会馆就有广东、浙江、福建、湖

广、江南、山西、陕西、江西等八大会馆和药材帮、棉花帮、绸帮、广货帮为首的十三行帮，人称“左右两条江，上下十三帮”。随着商贸业的发展，金融业也发展起来。清初有钱铺，继而有票号。1891年时，票号已成为重庆金融业的主宰，官场存款、京都解款、公款交纳等都由票号代理。1895年左右，经营兑换、倾销的线铺开始经营汇兑及小宗商业存放款，演为钱庄。清代重庆的工业、交通业、金融业、商业和外贸业都渗入了外国资本，外国人在重庆办工厂、办公司、办银行，吸引一些商人专门为洋行、洋人工厂办事，他们成为重庆早期的买办资产者。

1911年，清帝退位，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整个民国时期，重庆近代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重庆近代经济的基础。民国初年，重庆有人口100万，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到重庆，随即大批工商企业、银行、社会事业团体亦迁来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重庆成为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到1946年，重庆人口增加到124万，成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民国初年，在清末已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上都有所发展，并且出现了皮革、食品等新兴产业，呈现出以纺织、日用化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轻型工业结构。民国时期，建筑业、建材业、机械制造业、钢铁业等相继兴起，重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大大增加。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工厂迁来重庆，国民政府根据战时的需要，对生产军品者和为生产军品配套者，在投资、贷款、税收、技术人员、利润等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扶持政策，对轻工业的发展则实行限制政策，促进了重庆以生产军品为主的重工业的发展，使重庆工业经济结构出现以重工业为主的格局。

民国时期最早兴起的是皮革业，1912年，出现初具规模的皮革厂；1932年，成立重庆第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建筑业从此兴

起；1933年，有人办起煤油厂，石油化工业兴起；1937年，四川水泥厂建成，建材业兴起；20年代，随着军阀混战的需要，以修理枪械为主的机械修配厂应运而起。30年代、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以生产枪支等军品为主的机械工业有了长足发展，迁渝的工厂中，机械厂为数最多；1937年，重庆钢铁厂正式建成投产；从此，冶金工业发展起来；1938年，中国无线电公司迁来重庆并于1939年复工生产，此后，重庆电子及电讯设备制造业发展起来；1938年，上海龙章造纸厂迁来重庆江北苗儿石，机器造纸业由此发展起来。清末兴起的纺织业在民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清末重庆已有手纺和印染，30年代前期重庆有了铁轮机织布，抗日战争迁厂运动之后，重庆迁来一些纺纱厂，从此，重庆具有了从纺纱、织布到染整的生产能力。民国时期，1938~1940年的工厂内迁是重庆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到1941年前后，迁到重庆的工厂陆续复工，同时，也开办了不少新厂，机械、冶金、化工、纺织、建材、食品等产品成为了重庆工业的主体。据民国政府统计，到1945年，重庆共有工业资本27.26亿元（法币），占国统区的1/3，占四川省的50%以上；共有工厂1356家，产业工人15万人。

民国时期，交通运输业、尤其是川江航运业发展很快。民国初年，川江航运主要是外国轮船。1926年6月民生轮船公司成立，到1931年，该公司已拥有资金35万元（法币），先后兼并了10多家华资轮船公司，实力雄厚，成为川江的主要运力，打破了外国轮船把持川江的局面。1937~1940年，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和工厂迁川运动，川江航运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不但各轮船公司客货满载，连木船也不敷使用，船运业增加了资本实力，资本雄厚的民生公司开始向工业投资，兴办工厂、矿山。30年代，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相继出现。1931年，汉渝民用航空线开通，此后，重庆与宜宾、成都、上海、香港以及国统区大中城市的航线

陆续开通，还开通了重庆——河内、重庆——仰光、重庆——苏联等国际航线。1933年，民国初年开始建设的成渝、汉渝、川湘、川黔公路次第通车。

民国时期，外贸有了很大的发展。1922年，重庆外贸总额上了3000万海关两，1926年达到4000多万海关两。由于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外贸逆差状况较清末有所好转。出口货物第一大宗产品是丝茧，还有猪鬃、肠衣、药材、牛皮、羊皮、桐油、烟叶等33种；进口货物有棉纱、棉布、金属材料、染料、肥皂、钟表、摩托车等61种。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对外贸易量大大下降，而国内商业在陪都时期却有较大发展，重庆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百货公司，商业企业大大增加。到1945年，重庆有商业性公司1460个，有商店4.7万个，经营服务类别达22大类。

民国时期，重庆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民国初年，钱庄取代票号在金融业中占了主导地位。1915年，商业银行逐步兴起，1937年后，商业银行在金融业中居于主导地位，还有不少政府开办的银行。抗日战争后的1941年，重庆有各类银行145家，包括政府官办银行、商业银行、外地在渝分行等，还有钱庄71家。1946年，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为251家，仅次于上海，各行庄的存款之和占全国存款总额的10%以上。

民国时期，尤其是陪都时期，市政建设有了长足发展。1940年成立了“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以“把重庆建成世界大都市”为目标，对重庆的市政建设作了统一、全盘的规划，建设了市内电话、长途电话、电报、自来水、下水道、城区公路和人行道、码头、公园、医院、学校等市政设施。

民国时期，重庆城郊的农业生产也有所发展。据民国政府统计资料，夏季农作物有稻子、玉米、高粱等18种，秋季作物有小麦、大麦、菜籽等9种，蔬菜种类上百种，饲养家禽有猪、鸡、鸭、羊、牛等。民国时期，由于蚕茧、猪鬃是大宗的出口产品，

从而使种蚕桑、养蚕、养猪成为重庆重要的农副业生产。

民国经济一开始就伴随着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爆发后，通货膨胀更加严重，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据民国政府统计资料，1947年比1937年，重庆商品的食物类价格、衣着类价格、燃料类价格、成万倍地上涨，到1948年，通货膨胀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地。1948年8月19日，政府禁用法币，发行金圆券；1949年7月又发行银圆券，同年8月，重庆市面拒收银圆券，零星买卖改用棉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以张际春为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为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重庆，到1950年2月完成了接管工作。从此，重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重庆在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历了几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2年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953~1957年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1958~1965年中的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第四个阶段是1966~1975年中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五个阶段是1976~1982年中的经济冒进和再次调整时期；第六个阶段是1983~1985年中开始进行的综合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期。

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重庆市政府首先接管重庆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领导机构，掌握了领导权；没收了官僚资本，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和官僚买办分子所经营的工厂、银行、商店、铁路、矿山、船舶、码头、仓库、邮电通讯、电厂、水厂等企业及其全部资产（对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官僚资本中的民族资本家的私人股份不予没收），控制了重庆经济的命脉。在没收的官僚资本中，共计有黄金7228.58两、白银8535.68两、银元136084元、美钞50137元、港币4439元、银元券3281万元、工矿企业33家（有职工4341名）以及大批的生产、生



活物资。同时，在城郊农村开展了减租退押和清匪反霸运动，胜利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然后给广大的佃农分配耕地、住房、农具等基本生活生产资料。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稳定经济，恢复生产，为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新中国建立前夕，国民经济已陷于崩溃。多数工厂由于通货膨胀和交通断绝处于停产瘫痪状态，大批人员失业，物价飞涨。重庆市政府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从治理通货膨胀着手，组织恢复生产，稳定经济。1949年12月10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禁用伪币（包括金圆券和银圆券），以人民币作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5天之内便收兑完毕伪币。紧接着，于1950年3月贯彻执行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重庆市实行了统一收支、统一贸易，统一现金管理的各项制度。同时，积极疏导交通，组织市场供应，稳定物价。1950年3月先后成立了国营批发和零售机构，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煤等由国营零售公司组织供应，或者通过合作社直接分配到市民手中；帮助私营商业解决困难，支持他们恢复营业，从而控制了物价飞腾的局面，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在1950年3月，中共重庆市委提出了有区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成立了重庆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组织恢复工农业生产。到1950年底，大多数工商企业开业生产，由此带动了金融业务的开展，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农民分得土地后，政府在政策上又给以扶持，农业生产也很快得以恢复。到1952年，重庆的国民经济有了恢复性的发展。1952年比1949年，全市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增长58.9%，年均增长16.7%。

1953~1957年是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期。这一时期；重庆市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